

伶 仃

伶仃

邢院生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作者近影

作者小传

邢院生，女，1927年生于河南开封市，1934年始，先后就读于南京豆腐巷小学、北京香山慈幼院、北京培元小学、北京贝满女子中学，1954年始在北京医学院劳动卫生研究生小组学习，1963年始为北京铁路总医院理疗科技人员，1978年至1984年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1988年至1989年5月，任中国奥林匹克出版社顾问，现旅居美国。

邢院生因为曾就读于培养出冰心等著名作家的贝满中学，加上自己的努力，早在中学时就有散文作品问世，只是因为社会的动荡，命途之曲折，职业的限制，而没能将文学这一事业坚持下来。然而，丰富的生活经历、坚实的文学功底，加上想做什么就一定要做到，并且要做好的性格，终于使她有自己作品问世。当她从医时，就曾编写医学著作，当中国处于历史上罕见的灾难时期，她没能让变幻莫测的风云，泯灭自己的宿愿，并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条件下，写出《动荡三部曲》的第一部《叛女》，嗣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地写出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女伶》、第三部《伶仃》，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短篇作品问世。

邢院生的小说，文笔老到，知识丰富，往往在娓娓动听的故事中，描绘出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以及大千世界中多姿多彩、纷纭复杂的社会场景。读来不只令人对书中人物的命运倍加关切，同时，也会对不同时期的中国社会有着不同的思考。

远处天一隅，苦困独伶仃

——摘自李陵《赠苏武》

献给我最爱的孩子们

——作者

序

洪 钧

隆冬时节，窗外正纷纷扬扬地飘着入冬以来最像雪花的雪花。
一年又将过去了。

我一年来，折磨我多年的耳病，再也不允许我对它视而不见、麻木不仁了，因此，在医生的指令下，我只好住进不想住的医院，进行长达近半年左右的手术治疗，尽管如此，我身边一直有一部长长的书稿，令我时而为书稿中提供的情节焦灼，时而愤慨，时而替人物的命运捏着一把汗，时而为作者对生活的深透了解钦佩不已。这就是邢院生的长篇小说《伶仃》。

现在，作为长篇小说《动荡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伶仃》，即将付梓与读者见面了，恰逢此时，远在美国加州的作者邢院生，却几次嘱我为她的书撰写一篇序言，理由很简单，在将近十五年的交往中彼此了解而又构筑了一架友谊的桥梁，同时，由于工作关系，在80年代初，经过我的手发表过她的一些短篇小说，后来，我又是她的长篇处女作《叛女》的责任编辑，对她以后的几部长篇即《动荡三部曲》中的每一部作品的书稿，都曾经一一拜读过，有幸成为这几部书最早的读者之一。

为别人的书写前言或序言，对我虽然不是第一次，然而为院生的长篇大著写序，毕竟有些忐忑不安，这不仅因为在我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邢院生就曾发表过散文作品，更主要的，还

是她的丰富阅历以至对人生的理解、对生活的无与伦比的勇气，这一切，在我都要引以为师，为我所钦佩，为我所敬重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为她的书写序，就不能不令我举步不前了。但是，恭敬不如从命，况且这也是我继续了解她与她的作品的一个难得机会，所以，便不揣冒昧，斗胆为之了。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有幸与院生有了文字之交，记得当我第一次见到她的短篇作品时，她那老练的文笔就引起了我的极大的兴趣，尤其在字里行间，还能看到她在古典文学方面有着深厚的功底，这在我们收到的大多数青年习作者的来稿中，是所见不多的，因此，她的短篇很快就在刊物上刊出了。以后，随着时日的增长，我对院生的了解也越来越多了，我们之间，不只在文学上成了无所不谈的诤友，同时，她也是我在为人处世上的一位老师。

那院生，听起这个名字，人们会以为是一位男性，其实她却是一位女性，一位既有着十足女性特点又不同于一般女性的人。大约是养生有术，或是毅力超群的缘故，每次与她相见，即便是相隔一两年、三五年再与她相见，她都是那么生气勃勃，精力充沛，总有做不完的事情，总有干不完的工作，总有层出不穷的设想与打算。只要是同她在一起，人们就会有一种感觉，这就是一个字：忙。

那院生的这种状态，不只是为同龄人惊讶，甚至为年轻人所望尘莫及，称羨不已。其实这种精神状态的存在与保持，并非是年龄给她的，因为早在本世纪初的1927年，她就来到这个世界上了。

那院生有个特点，做什么像什么，不做则已，要做就要做到，就要做得像个样子。因此，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珍惜时间，平等待人，严守信誉，已经成了她不可改变的生活习惯与人生信条了。除此之外，就是一位医生的职业习惯，一是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要有条不紊，井然有序，二是要把自己的工作与居住环境搞得一尘不染，几净窗明，如若不然，她不仅会不安生，甚至宁可不吃，不睡觉也要打扫干净，那怕电话拨号盘的号码眼，也要一个个地擦得干干净净。一些不熟悉她的人，看她那么雷厉风行，一丝不苟，对工作严肃认真，办事情说到做到，都有点惧怕她，可是，时间一久，人们就会发现，她不但敢于承担责任，敢于承认错误，同时，她还是个颇具菩萨心肠的人，对值得同情、应该支援的，她可以大把大把地拿出自己节省下来的钱；对不该浪费的，哪怕是有人掉在马路上的棵新鲜蔬菜，她都要心痛，都要捡起来。当然对不值得同情、不值得支援的人，她甚至可以板下脸来，一毛不拔。因此，熟悉她的朋友与同志们，都对地以“院生”相称，晚一辈的，就亲切地称地为“邢妈妈”，至于儿子小宝（禹门）、小典（少杰）、小光（澄宇），女儿小丽（奇志）以及儿媳小敏、张婴、鲁宁等人，每每提起院生时，便以颇具戏谑味道的“老太太”相称了，即便在她还不是一个老太太的时候，也是这样。这也说明了她与儿女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因为她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与孩子们，不只是长辈与晚辈的关系，更主要的还是朋友。”

邢院生是个医生，并且是位有着医学科普著作问世的医生，然而，她却令人不解地写出小说来了，并且不是一部两部，而是有一百多万字的三个大部头——《动荡三部曲》。到目前为止，以《叛女》、《女伶》、《伶仃》这三部长篇小说组成的《动荡三部曲》已经全部竣工了。屈指算来，这三部书从初稿到付梓，将近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时间。桑田沧海，由于众所共知的原因，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神州大地历经了多少令人难以忘怀的变化啊！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文坛曾有那么一段时间，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一时间，出现一股小旋风，在这股风刮起来的时候，“现实主义”被一些根本不懂现实主义的人视为“人老珠黄”、不屑问津的“过时货”了。仿佛当今的文坛上，属于现实主

义的作品，只好“自愧弗如，靠边站”了。

当这股小旋风越刮越烈的时候，也是邢院生正在出版或修改她的《动荡三部曲》的时候，然而，邢院生却说她不是作家。她既不与作家们有太多的来往，更不要说受这样那样的时髦风的影响了。邢院生就是邢院生，她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撰写与修改着自己的作品，结果，一直撰写出与修改了一百多万字，厚厚的三大本。

邢院生没有高不可攀的文学主张，更没有令人惊讶不已的艺术技巧。但是，她却拥有一些人所不具备的丰富阅历与对人生的深切感受，她懂得文学离不开生活，搞文学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因此，从她的长篇处女作《叛女》，直到《动荡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伶仃》，我们都可以看到她的作品在毫不掩饰地向人们展示着令人可喜的魅力，这就是现实主义的魅力。

文如其人，要了解院生作品的现实主义魅力，就必须了解院生其人。

要说院生，不能不说到她的父亲与母亲，更不能不说说她的家庭与她的家史。

清末时期，朝廷中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命臣端方。端方字陶斋，号午桥，为托忒克氏，属满洲正白旗人，先为举人，后为员外郎，光绪24年出直隶霸昌道，此后在京师创立农工商局，任陕西按察使、河南布政使、湖北巡抚、湖广总督、两江总督，此人颇志兴学，派遣学生出洋深造，以后又出使世界各国考察政治，再后，在四川保路风潮中同其弟端锦一道入川，弟弟端锦见哗变军官刘怡凤闯入室内，为维护其兄端方的安全，挺身而出，挡在端方身前，结果被对方击毙，其后端方也死于非命。这样兄弟二人就死在这场风波中。端方其人身为朝廷命臣，除具备封建官僚的一些属性之外，其人在性格上甚为豁达，不拘小节，交往广泛，笃嗜金石与书画，收藏甚丰，著有《陶斋吉金录》、《藏金记》等。总之，邢

院生有一个属于封建官僚阶级的外公。这就是所谓的两江总督端方的亲弟弟。

院生的母亲陶默厂(an)，作为清朝末期的两江总督端方的亲侄女，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权柄显赫、有着墨宝书香的家庭里，优越的社会地位，安逸的物质生活，使她自幼生活在诗书堆里、鼓瑟声中，因此，经史诗文，棋琴书画，说拉弹唱，无所不爱，无所不工，其中尤其酷爱戏剧艺术，早在三十年代，就曾与中国的京剧大师梅兰芳等多有来往，是这位大师的第一个女弟子，成为戏曲舞台上名噪一时的“名票”。当时，在戏曲界被称为“陶六爷”的陶默厂，虽为女流，却心地善良，刚直不阿，恃才傲物，为人豪爽，怜弱惜贫，挥金不吝。陶默厂所处的时代，虽是清王朝崩溃时期，但是官宦家庭中的封建礼教还是十分顽固的。鉴于此，陶默厂的所做所为，自然要使家中的封建遗老遗少们，感到辱没祖训，违背家规，大逆不道，有伤风化，自然是不肖子孙了。应当指出的是，邢院生只继承了母亲那种心地善良、刚直不阿的性格，却没有继承母亲的事业，而继承母亲所好的却是弟弟陶荣生，他历经坎坷却不折节，致使成为当今京剧舞台上的一位真正的“名票”，并在京津沪的大奖赛中，彩声四起，赢得殊荣，名扬海外。

一个人性格的形成是多方面的，有时候是靠正面教育形成的，有时也是反面力量造成的，所谓压迫愈深，反抗愈烈就是这个道理。陶默厂对封建家庭的叛逆，恐怕也有来自反面的因素。常言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陶默厂的家庭虽然受到时代潮流的冲击而败落了，但是，封建礼教在这个家庭中还是根深蒂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出身于朝廷命臣家庭中的陶默厂，后来竟然与革命党人即邢院生的父亲邢肇棠结合，就不能不看出这位妇女的叛逆精神了。

邢院生的父亲邢肇棠，在北伐革命时期是孙中山先生的积极

追随者，只是后来的“4·12”九江惨案发生后，邢肇棠不满蒋介石对国民党左派的残酷镇压，积极参与了“倒蒋”活动，因而被通缉，被追捕，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追求美好的理想，为了拯救自己的祖国，他毅然决然地离开妻子陶默厂与刚刚出生的女儿院生（另名陶稚厂），来到共产党的队伍中，在毛主席的关怀下，成为一名共产党人，并在延安担任晋冀鲁豫边区的参议长。

邢肇棠离开家庭，投身革命，无疑使院生只能与母亲陶默厂相依为命，过着艰苦飘零的生活，但是，陶默厂并非寻常的女性，她用自己从事舞台艺术所得的收入，去抚养自己的女儿，即使在战争频仍的时代，也能让女儿到北京人才辈出的培元小学以及贝满女子中学学习。当这母女俩在战火中四处奔波的时候，邢院生无论在南京的豆腐巷小学或是到北京的香山慈幼院以及贝满女中，都要带着一部《白香山词谱》。白居易这部“前不照古人样，后不照来者议”，主题鲜明、措词尖锐，又能打破“怨而不怒”这一传统的现实主义诗词作品，深深地影响着院生，在她年轻的心灵中，不仅萌发了酷爱文学的种子，同时，也使她对文学的现实主义使命有了深刻的认识。

新中国的诞生，使院生终于同从延安归来的父亲相见了，从而结束了凄苦离散的生活。父亲任职的地址虽然多有变化，邢院生的学习并没有因此而延误。她先后就读于宁夏卫生学校以及北京医学院，以后又在北医附属医院及铁路总医院工作。在此期间，开始实现着青少年时期的理想，把自己家族的历史——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缩影，写成了长篇小说，这就是后来的《动荡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叛女》的初稿。然而，邢氏一家还是命运多舛。担任河南省副省长的邢肇棠，因为不会像有的人那样报喜不报忧，说了几句真话，被错定为右倾错误，并且很快地离开了人间。到了1968年，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像邢院生这样生来就喜欢讲真话、又敢于讲真话的人，自然逃脱不了林

彪、江青的毒手，终于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室里扣押了足足有四年之久。在此期间，作为解放军海军副艇长的儿子小宝因为不齿于“四人帮”的那一套，被关押在某海军基地达十年之久，粉碎“四人帮”后，终于被平反；正在读书的小典，有书不能读，有学不能上，只好充当保姆照顾着刚刚十岁的弟弟小光和不到十岁的小妹妹小丽：家里被抄得一塌糊涂，连院生用多年心血写成的小说初稿，也当成反革命罪证给抄走了。但是，孩子们知道善良的妈妈是被冤枉的，他们喊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不过，幼小的孩子知道党是能主持公道的，因此，结伴来到北京的新华门前，坐在马路牙子上，等待着能遇到邓颖超奶奶，以便申诉妈妈的冤情。他们是带着满腔的希望去到新华门前的，然而，在“四人帮”肆虐的当时，孩子们的天真幻想，只能随着冉冉落日，在逐渐地消逝着，幻灭着，结果，他们只好饿着肚子，回到徒有四壁、被查封得一片狼藉的家里。被关押的院生也如同劳改犯一般，被造反派们凌辱着，批斗着。即便这样，邢院生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理想，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作品。在牛棚里写作是不可能的，但是，院生却在“毛选”的字里行间，利用只准交待“罪行”的一支钢笔，以编写毛主席著作索引的名义，在夹缝中写着自己的小说提纲。笔尖写秃了，就在水泥地磨一下，然后再写。如此周而复始地写着，如此不停顿地磨着，最后不只写完了自己的提纲，同时，也编完了毛主席著作的索引。

院生对自己创作的痴迷也是一些专业作家所望尘莫及的，至少，像我等这样自以为不敢偷懒的人所望尘莫及的。为了写出这部书，不只是在牛棚里巧妙地进行着写作与修改，据说，过去，她曾在公共汽车上记录着自己的构思，当她从牛棚回到家时，适逢岁终，正当人们欢度新年的时候，她却是一坐下来就修改作品。当《动荡三部曲》中的《叛女》与《女伶》出版后，适逢她去美国探亲，即便这样，也没有忘记带着《动荡三部曲》的第三部《伶

仃》。现在，让我先睹为快的《伶仃》，就是在美国经过再度修改后，由朋友们捎到国内来的。

纵观《动荡三部曲》，我们不难看出作品一直在向人们展示着现实主义的魅力。

《动荡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叛女》，以浓重的笔墨，讴歌了聪慧、美丽、多才多艺的女性润格叛逆封建家族，心向革命，走向革命，为革命作出自己贡献的故事。

润格出身于封建家族，是一个在安逸、充裕的家庭中成长起来。并深受封建礼教、封建文化教育的女青年，按理应该是一个封建礼教的卫道者，是封建文化的拥护者。但是，封建家族的腐朽、没落、残忍、无道，引起了润格的极大反感，尤其当这个家庭对润格的性格进行残酷束缚时，她的反感就日加强烈了，特别是当她得知自己是托府的老爷买来的一个丫头白颖生下的女儿时，这种反感便成为一种逐渐成熟的叛逆，这是一种为了新生，为了光明，为了明天而叛逆没落，叛逆黑暗，叛逆昨天的叛逆，是响往新生，响往光明，响往明天的叛逆。正是有了这种叛逆，润格才能同情弱者，站在丫头、使女、佣人的一边，站在劳动人民的一边，才能反对旧礼教沿习下来的婚姻，最后毅然决然地离家出走，并在作为革命者的丈夫的熏陶下，使自己那种不自觉的叛逆，成为更为自觉、更为坚定的叛逆精神，以至心甘情愿地为革命做出自己的贡献。

与《叛女》有联系又能独立成章的《动荡三部曲》的第二部《女伶》，不但在《叛女》的基础上，把小说的背景从一个封建家庭拓宽到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同时，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从而使润格的性格有着更深刻的社会意义，更丰富的社会内容。为了革命，丈夫江放离开了相亲相爱的妻子润格与女儿江风，到了革命根据地延安去了。这样，这母女俩，便如同风急浪高的险流中的一叶简陋的木舟一般，随时

有被吞没、被倾复的危险。这是因为在她们的生活周围，充斥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张着血盆大口的黑暗势力，以及随着国家形势变幻，强行入侵的日寇与应运而生的一些穷凶极恶的汉奸走狗，总之，在她们的周围，连人们呼吸的空气，都是充满毒素的。但是，追求新生追求光明追求明天的理想，在鼓舞着润格与她的女儿江风，从而使她们显示了出污泥而不染，居囹圄而不从的高贵品格。润格以卖艺为生的生活本来就是清苦的，再加上国破山河碎，中华民族正处于最危险的时候，这样，不只是人们的生活没有保障，连起码的人身安全也是没有保证的。在这种情况下，润格没有忘记自己为了新生为了光明为了明天的历史使命，她巧妙地同一些汉奸走狗们周旋着，为革命提供着宝贵的情报。这中间小说塑造了正义力量的群像，同时，也勾画了一些反面的丑类。清时的戏剧作家李笠翁有话，他认为一部作品的结构应是“凤头，豹尾，猪肚子”，这话是说，作品的开头应该像凤头一样美丽，惹人注目，而内容更应该如同猪的肚子，丰富而又饱满。《女伶》的内容就同李笠翁所说的那样，是丰富与饱满的。矛盾纠葛错综复杂，人物关系纵横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有并不上流的上流人物，又有并不下流的下流人物，总之，作者为我们提供了黑暗社会中的群生像。最后，受汉奸走狗黄子廉唆使的、润格前夫的儿子奎纲，在探监时，用一双罪恶的双手掐死自己的亲生母亲，更是出手非凡。这是因为小说在展示这样非同寻常的情节与事件时，并没有简单化，模式化，而把这一情节与事件，放在人性与兽性、善良与邪恶的激烈搏斗之中。读来不能不令人惊心动魄，屏住声息。

母亲的被害，父亲又不在身边，这样，黑暗中只剩下一个孤苦伶仃的女儿江风了。这了避免被汉奸黄子廉吞噬与蹂躏，江风在要好的朋友与同学的安排下，不得不与自己并不相爱的父亲朋友的儿子古复生结婚。这样，小说又向人们展示了新一代的群生像，如与江风偶然相遇并产生爱情的银行家方仲理，革命烈士的

后代、孤儿并被汉奸黄子廉收养过的柳文如，深受黑暗势力迫害而又差一点走向黑暗的林蓓嘉，虽是汉奸的儿子却与汉奸背道而驰的、与江风相爱又不能爱的黄伯云，北平高等院校里的一些进步与反动的学生，正义、善良、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仆人刘三奶奶，以及有着深厚社会背景的汉奸妻子王国玉和她的女儿们，除此之外，还有润格前夫儿女的养父奎啸虎，娼妓出身、名义上以相师为业，实际上是黑社会女头目的金倩等等。但这一切都是围绕江风的命运展开的。这就是《动荡三部曲》的第三部《伶仃》给读者提供的内容。日本人来时为汉奸、日本人投降后又为国民党要员的黄子廉，不只与江风有着杀亲之仇，同时，他一直在觊觎着江风的美貌，并想把她收为自己的第十四房姨太太。他的所做所为，给江风的生活与爱情带来了不可逆转的灾难，使江风的肉体与精神，一直处于不堪忍受的痛苦之中。这对江风来说，不能不燃起复仇的怒火。最后，江风真地向黄子廉复仇了，遗憾的是，江风毕竟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她的手枪并没打中自己真正的仇人，却打死了一个女特务、黄子廉的情妇何伟。江风的这种复仇方式虽然有着她的盲目性，同时，从艺术处理上看，也颇多粗疏与草率之感，但毕竟是真实的可信的。盲动的复仇方式，以及就其个人来说，与敌人力量相差悬殊的条件，必然决定她再度落入敌人的魔掌之中，最终，只有在党的组织与安排下，才逃出魔掌，得到营救，才能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看到真正的新生，真正的光明，真正的明天。

“精神产品这个既是具体的又是想象出来的对象，只有在作者与读者的联合努力下才能出现。只有为了别人，才有艺术；只有通过别人，才有艺术”，这是萨特根据自己创作的体会，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这就是说，一部艺术作品必须而且应该为了“别人”，通过“别人”，也就是说要为了读者通过读者。做到这一点，作家的作品就应当让审美的主体容易接受、能够接受。

《动荡三部曲》以润格及其女儿江风的坎坷命运为主线，从清王朝崩溃时起，经过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写到祖国的黎明。这也是人物命运的黎明，中华民族的黎明。这是人们所关心的一个历史时期，更是我们的后代应该了解的一个历史时期。因此，用小说的形式，真实而不是虚假地，形象而不是概念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是文学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任务。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个任务由一个素来与文学界很少来往的院生从事着，并卓有成效地写出这部长篇大作。我们说这部作品是真实的，不只是因为作品有着明显的传记性，更主要的，还是与时代的步伐相吻合。

任何一部文学艺术作品，都是靠一定的创作方法表现出来的。所谓创作方法，主要是指作家从事创作时如何认识和表现社会生活的一种艺术方法，也就是任何一个作家都要在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着一定的美学原则。这也反映着一个作家对现实的态度，规定着艺术形象的构造方法以及现实生活的艺术概括的方法。

应当承认，文学创作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强调任何一种创作方法，而排斥或是蔑视其它的创作方法都是无知的表现。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第一次将描写人物的方法作为一种方法提出来的，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在《诗学》中认为，在对人物的描写上有两种方法，一是按照人物本来的样子去写；另一种就是按照人物应当有的样子去描写。尽管如此，亚里士多德的论说，并不说明他是世界上第一次提出创作方法的人，而真正第一次正式使用创作方法这一概念的，却是德国的歌德与席勒，这一点在《歌德谈话录》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但是，无论怎样，在诸多的创作方法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是其中最重要的。其中现实主义又是产生诸多创作方法的基础。现实主义偏重于对事物做客观的描写。作家的审美要融化于艺术描写之中，这就要求作品的细节应该是真实的，艺术概括也应该是典型化的，要在典

型的环境中去描写去塑造典型的人物。

《动荡三部曲》从清王朝的末期，一直写到新中国解放的前夕，也正是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过程。文学可以表现政治生活，也可以表现经济状态，甚至可以表现诸如历史乃至人文地理、民族风习等广泛的内容，但是，文学就是文学，绝不是也不应当是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更不是一部中国社会发展与变化的编年史。《动荡三部曲》之所以是一部有一定分量的文学作品，主要在于通过封建贵族家庭出身的千金小姐润格及其女儿江风，在风云变幻的年代的坎坷命运，表达她们走向新生走向光明走向明天的勇气与决心。她们也曾经为新生的艰难而苦闷，而徘徊；在与腐朽、黑暗进行斗争时，有时也显出了一定的幼稚与简单，但正因为这一点才表现出这部书的真实性与可信性，同时，我以为，更为可贵的是，作者在表现一些人物的命运时，与时代的步伐是环环相扣的，而没有让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同国家与民族的命运相游离，相分割。总之，《动荡三部曲》对自己要表现的生活作出了客观的描写，同时，也是以真实可信的细节取得了读者，是遵循了现实主义创作的原则，从而表现了现实主义的魅力。

对一般的读者说来，作为王公大臣的托方以及托方的府邸，作为在这个府邸中生活过的千金小姐润格，这一切都为一种扑朔迷离的神秘的外衣包裹着。这些生活，如若放在一个喜爱故弄玄虚的作家的手中，不知道会写出怎样玄而又玄的作品来。海明威有一句名言：“真正的神秘主义不应当与创作的无能混淆起来，无能的人在不该神秘的地方弄出神秘来，其实他所需要的只是弄虚作假，为的是掩盖知识的贫乏，或者掩盖他没有能力叙述清楚。神秘主义包含一种神秘的东西；但无能并不是一种神秘；过火的报刊文字插进一点史诗性的东西成不了文学。也要记住这一点，一切蹩脚的作家都喜欢史诗式的写法。”海明威的这一论断，也不幸